

Culture and Life

文化 生命

——中国变迁的人文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魏波◎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ulture and Life

文化 生命

——中国变迁的人文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魏波◎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生命:中国变迁的人文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魏波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301-22059-7

I. ①文… II. ①魏… III. ①人文科学-科学思想-研究-中国
②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科学-思想评论 IV. ①C52②A8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3221 号

书 名: 文化与生命——中国变迁的人文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著作责任者: 魏 波 著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059-7/B · 110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hlgs0380@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6 875 25 印张 16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言	(1)
1 社会文化变迁中“人”的问题	(5)
历史与现实中缠绕着“人”的问题	(5)
社会主义实践中“人”的问题	(10)
从人文视角反思“人”的问题	(13)
2 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互动模型	(17)
理论假说与基本变量	(17)
静态的社会结构之约束性力量	(19)
动态的社会文化变迁机制	(25)
3 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塑造	(29)
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	(29)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对人的规定	(34)
成长力量与衰退力量的斗争	(38)
4 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人文诉求	(43)
近代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人文诉求	(43)
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及其人文诉求	(51)
5 马克思主义对时代问题的回应	(57)
对时代问题的回应	(57)
本土化的融合过程	(61)
在重读马克思中回应时代新问题	(66)
6 马克思的总问题:人的奴役与自由	(74)
马克思的总问题折射其思想关怀	(74)

总问题形成的思想进程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78)
总问题的理论建构与解决路径	(82)
7 人文世界观与批判方法论	(86)
启蒙理性的批判方法论	(86)
“生命是什么”的追问	(91)
实践基础上的人文世界观	(96)
哲学新范式展现其人文思想	(101)
8 现代性批判的人文向度	(104)
现代性的反思性特征与批判传统	(104)
现代性及其危机:人的意义世界的危机	(107)
在现代性批判的行动中克服危机	(114)
9 以平等和自由理解人	(120)
现代性与平等冲突的内在机制	(120)
冲突的克服: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中的矛盾	(124)
现代性与自由的矛盾机制	(126)
在克服矛盾中探索新自由	(130)
在重新认识人中理解社会主义	(133)
10 意义世界建构的人文取向	(139)
在变革现实的外在超越中实现人的解放	(139)
在克服人的片面发展中实现生命的丰富性	(145)
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的价值	(152)
在人的自我超越中重建意义世界	(155)
对马克思人文思想的重新认识	(159)
11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结合的新飞跃:践行人文理想	(161)
对时代生活的介入	(161)
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再次回应与新的飞跃	(164)
从可能到现实:马克思思想的新跨越	(167)
以制度创新实现人的再造	(171)

在探索新路中解决“人”的问题	(177)
12 在文化变革中谋求人的新生	(181)
时代与文化战略	(181)
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186)
文化战略需要以人文思想为核心理念	(195)
结 语	(200)
 参考文献	 (206)
后 记	(211)

导 言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一直在争论中进行,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汇成蔚为壮观的思想洪流,各种方向不同的社会运动也在冲突中一次次掀起历史的波澜。仔细观察当下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一个世纪前所讨论的一些思想问题依然在被讨论,一些根本性的困境依然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人们,这种现象也展现了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然而徘徊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犹豫只能让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只有走出这种犹豫和徘徊才能推进社会和文化的新变革。解决问题需要从发现问题入手,尤其是要找出现实生活中的关键问题。那么,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提出问题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当人向自己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超验的普遍性问题时,哲学思想就开始萌芽了。问题的提出是挑战生命有限性的边界,其回答则展现了人类精神的方向与高度。一个普遍问题便是: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将人本身作为一个对象去认识。人类在走过了漫长的生物演化之后发现了“人”的存在。“我是谁?”这个疑问在空旷的原野中回荡、振动了人的心灵。当人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切都在懵懵懂懂中流逝着;可是当问题猛然降临时,人就像被带到了悬崖边上。“认识你自己”,古希腊人提出了这一发人深省的命题,由此也开启了西方思想发展的道路;当孔子在深刻反省自我的时候,中国文化进入新时代的大门也被开启。人用自己的行动和理性不断回答这些问题并赋予生命以新的内涵,文明史也便成为人认识和发展

自己的历史。在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类走出了混沌,走向了自觉,生命的无尽创造活力开始释放出来。“人是什么”是从实然的角度对人的认识和规定,“人应当是什么”是从应然的角度对人提出的道德命令,“人可以是什么”则是对人的潜能和自我实现的认知与期许。生命的成长给人带来尊严和价值,这是亿万年自然演化和人类自我本质力量成长的结果。在代代相传的历程中,人类创造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世界。社会和文化的基本使命是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就需要对“人”作出基本的解释和规定,由此构成该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观念基石。由于各自发展的形态、所遭遇的问题以及地理环境等不同,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形成了对“人”的不同理解和规定,直接影响了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形态各异的人类生存状态归根到底可以在这种对“人”的理解和规定中找到根据。于是,观念与行动、理性与激情融汇成壮丽的生命景观,对“人”的追问不只是学理的讨论,更是生命本身的吁求。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重大选择都基于对“人”的理解和规定之上,于是对“人是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社会变迁的一个思想基础。在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交织中可以看出,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权利的扩大和自由的追寻是其中的基本诉求。因为对“人”理解的不同,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并激荡出新思想。在走过了曲折历程后,“人是什么”、“人应当是什么”、“人可以是什么”的问题依然深植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深层,这是理性反思的结果,更是生命深处的体验。可以说,这是老问题,从中国近代转型开始它就成为困扰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之一;同时它又是新问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新时期又呈现新的特征。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思最终是对“人”的反思,这不仅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实际问题。面对当下遭遇的矛盾和挑战,需要借助对“人”本身的考察去探寻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向。

探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需要从实际的生存境域出发,这时,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构成全球化时代人类思想的一部分;从中国实际看,它是左右现代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并依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探讨这一思想与实践的互动不只是策略性的选择,更是一种现实的要求。思想的价值在于回答生活中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能否回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要求?在反思关于“人”的问题中,马克思的人文思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成长时期并引导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潮,其历史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纷争。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太多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内涵,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发觉了人们对他的误读,马克思在世之时就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保持了距离。在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运动中,因为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读而形成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争议。诸多成见或偏见盘踞人们的头脑,教条主义使实践遭受了巨大挫折并催生了对思想本身的质疑。事实说明,不断破除种种误读,寻找到真实的思想脉络,是防止在行动中栽跟头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整体。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的是体现马克思思想精神要旨的“哲学”。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刻意去建构什么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或者经济学的体系,所有的理论、学说和行动融汇成一体,只有从这个整体中才能理解其真精神。

回到中国现实,面对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挑战,推进事业前进需要从思想上确立行动的指南。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介入现实并影响时代生活?这需要站在时代的立场上寻找理论走向现实的可能路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读的范例,它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通

过破除思想的樊篱而启动了改革议程。今天,如何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为现实中的迫切问题。为改革与发展探索前行之路,既需要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也需要在重读马克思主义中使其更好地走进当代生活。这时,关于“人”的问题再次横亘在人们面前,这一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之间存在冲突的集中表现,在实践中存在着对人的尊重不够的问题,在理论上则存在如何理解人的问题。从思想和理论的初衷说,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可为什么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却形成了对人的压抑?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人的,如何理解 and 对待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深层的哲学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这里,我们不是对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关系进行一般性探索,而是立足于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实践问题而展开讨论,因此,既有历史的分析,也有现实的观察;既有学理上的论证,又将它置于生活实践之中去认识。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是:首先,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诉求是什么?面向生活事实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和文化在近代以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社会文化的转型成为基本问题,其中,“人”的问题则是一个关键。通过反思“人”的问题、认识人的演变,可以揭示社会文化变迁的价值诉求与精神律动。其次,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挑战的理论可能在哪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有效地回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最终取得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需要再次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这不是按图索骥、主观附会,而是从其思想与事业中领会其精神底蕴。最后,如何将实践诉求与理论可能实现有效对接?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文化与制度的创新探索中寻求出路。只有实现整个社会和文化对“人”的认识的转变,才能为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确立坚实的思想根基;也只有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变革,才能将人文理想变为现实。通过社会文化再造实现人的新生,便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态势。

1 社会文化变迁中“人”的问题

凡俗的生活在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中一代代推演,每天上演着无数的生生死死,这再平常不过了;而当它们发生在个体的人身上时,又成了天大的事情。萧红在小说《生死场》中描述了 20 世纪中国农村平凡的生和死。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生与死是如此的平静,甚至令人窒息;然而,在这平静的生与死中也积聚着炙热的岩浆,终将喷涌出革新的力量。从魏源的“师夷”到康有为的“维新”,从孙中山的“革命”到鲁迅的“呐喊”,中国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历经无数生与死的抗争而浴火重生。切近的直观来自于个人的生命体验,真实的问题总是生发于个体生命身上。将有限的个体生命置于宽阔的社会历史时空中去考察可以发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始终为“人”的问题所缠绕。

历史与现实中缠绕着“人”的问题

现代中国的历史记忆充满了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梦想实现后的幸福和甜美,独立和解放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改革与开放使中国走向富裕和繁荣。另一方面则是剧烈的生命冲突,战乱与动荡是几千年历史的主题之一,现代中国同样如此,例如饥荒便是几代人无法抹去的记忆。对于历史与现实都要辩证地看待,成就值得人自豪和珍惜,问题则更需要正视和解决,因为这是改进生活的阶梯。最尖锐、最深刻的生命冲突表现在人的苦难体验中,它让生命陷入“极限困境”。苦难既是生命陷入困境的结果,也是困境的

一个标识,是人从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中切身体验和观察到的事实。这既是个体生命的事实,又是一个民族的共同遭遇,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矛盾和曲折在人身上的体现。它弥漫于人的生命历程,既包括个人经历的短暂时间,也包括一个民族走过的艰难征程。虽然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苦难构成生命本体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一种理论预设,但是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来说苦难似乎更为深重。因为这是距离当下最深刻的记忆,至今还存留在人们的心里;同时,这一时期经历了极为剧烈的社会震荡与文化变迁,战争、动乱、灾荒带来的深重苦难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苦难大都是“社会苦难”。个人的苦难都具有个体化特征和因素,比如家庭遗传、个人禀赋等,但更大的背景则是社会文化的结构及其变迁,导致苦难的根本因素是社会而非个人。^①人的生命体现于身体、心理、精神等不同层次,这些因素又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人首先是躯体的存在,最直接的感受来自于身体欲求的满足或挫折,身体承受的苦难就具有直观和现实的特征,对身体病痛的研究成为考察社会苦难的一条途径。由心理和精神因素导致的疾病总是存在着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直接作用,折射出社会文化的结构及其变迁。这时,自然与社会融合在了一起。百年变迁是中华民族饱经苦难的历程,这不仅体现为生命的涂炭、肉体的折磨,更表现为灵魂的挣扎与精神的困顿。这一切不仅有着个体性的差异和生命特质,而且在每个人的相同与迥异的命运中有着共同的时代和社会印记,因为社会冲突和变革的历史洪流塑造了个人的命运。不过,中国人没有被苦难所压倒,惨烈的冲突和对苦难的体验反而驱使人痛定思痛、在反思和批判中超越自我从而获得进步的

^① 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文革”之后的中国湖南地区的神经衰弱、抑郁症的实证研究,揭示出这些病痛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其中一个重要机制是“躯体化”——将背负有道德压力和社会舆论影响的心理精神问题转归于躯体上的病痛,从而达到了去道德化等目的。然而,这并不能消除痛苦。参见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思想和精神力量,在顽强的抗争中获得生命存续的意义。

社会苦难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艰难。过去百年中国的变迁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人追求梦想和希望的生命行动,人们在其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历史中同样充满了希冀与抗争,比较说来,由于这期间所发生的冲突和震荡主要是冷兵器时代和农业社会中较为简单的生存竞争,它们并没有在社会结构和制度文化上实现根本性的突破,结果,在人身上也难以出现鲜活的、新生的因素,痛苦和挣扎也总是在原地转圈。近代以来发生的变化和冲突则完全不同,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特征的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兴起进而走向全球,与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一种结构性冲突,导致了人所经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不同于以往。同时,因为社会变迁中出现了异质性的因素,这一冲突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苦难的同时也产生了文化新生的契机。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在社会文化制度的比较中,人们看到了传统社会的陈腐与衰朽,革新成为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打碎旧制度旧文化、寻找新制度新文化的革命和改良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从闭关锁国到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国门,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中国人在模仿与对抗、比较与选择中前进,世纪的轮回让人荡气回肠。在这里,传统与现代、衰朽与成长的力量彼此交织、此消彼长、反反复复,至今依然在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深处缠绕着人们。救亡图存的本能与革故鼎新的思想激发起反抗与斗争的意志,社会变迁成为与命运对决与抗争的历史。几代人传承不同和相同的梦想,也遭遇了不同和相同的结局。不论社会多么黑暗,理想的光辉都没有被掩盖,即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也到处可见理想的光芒。梦想在人们心头萌生,“主义”在传播和试验,人们在执著追求着心中的理想,20世纪可谓中国历史上理想主义最为高扬的时代。在这种与惨烈命运的抗争中,生命得到了历练,精神得到了升华,灵魂得到了安顿,命运的激越与悲壮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挫折、失败还是不断打击着中国人

的心灵,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如此尖锐,行动一次次地在现实中触礁,一团团理想之火被浇灭,一个个“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了乌托邦的社会试验激起一代代人的梦想,也带来一代代人的伤痛。比较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困难和曲折着实令人扼腕叹息。虽然这也是前进的台阶,但是付出的代价却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

那么,从何种视角去认识和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和文化?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首先映入人眼帘的是一些具体直观的感性经验,如经济的发展与停滞、政治的民主与专制、文化的包容与褊狭、社会的公平与不义等等。这与人们观察的视角有关,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为观察和书写历史的人所塑造,当生命只是被视为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时,历史就看不到生命问题。可是,撇开诸多宏大叙事和乌托邦理想而将目光投向参与历史进程的真实生命,会发现其中有一条核心线索贯穿其中,那就是“人”的问题。一切社会活动和思想观念都是人的创造,人是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进真实生命的深处便是思想探讨的可靠立足点。社会文化结构及其在现当代所发生的剧烈变迁塑造了人的命运,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机制便是理解人的基本路径。这既是理解过去和当下人的命运的途径,也是创造新的生命形态的前提。因此,这里对“人”的问题的探讨不是“价值无涉”的“纯粹科学”的研究,也不是文学艺术中的个人感性体验,而是试图将感受和体验到的生命冲突置于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中,从中理解个体以及自己民族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考察社会变迁中“人”的问题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最外一层是以感性直观展现出来的人的生命样态,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较为成熟的指标。深入一层是人格特质,这是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对人自我发展特征的描述。最深一层是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对人的理解和规定。“理解”是对人的认识和定义,包括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识;“规定”则是通过制度、文化等对人的规范和约定。这三个层面由表入里、相互作用,它们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

量。人的生命质量的提升会推动人格的改造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人格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生命质量。比较说来,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对人格特质和生命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展现出强大的约束性力量,故需着重分析。从事实看,中国社会变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中国人的生命质量有了巨大提升,人类发展指数稳步增高。一个典型例证是被称为“半边天”的妇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极大地推动了两性的平等及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浪潮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人的人格特质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另一方面,与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相比,十三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质量、人类发展指数则落后得多,在人格特质上还深深为传统所羁绊。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追根溯源还要深入到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的核心层面进行分析。

面向中国变迁的事实可以发现,在文化理念上如何理解人、在社会制度上如何规定人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矛盾、徘徊、困顿,建构实现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制度与文化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举例说来,2009年我国安全生产事故比较往年有较大减少,死亡人数降至9万以下。“以亿元GDP事故死亡率为例,2005年是0.7,2006年是0.558,2007年是0.413,确实降了很多,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差不多是人家的10倍。”^①这体现了现代性的风险特征,也可理解为快速发展的代价,在工业化进程中十分普遍。但是仔细分析,除了一些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大部分事故都是人为造成的,背后都可以追溯到在文化理念上对人的生命尤其是他人的生命重视不够,社会制度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保护也存在缺陷。

从内部反思,尤其是从不同文化的比较中观察中国人的生命,一个事实展现出来——过去百年社会文化变迁的剧烈震荡汇聚成

① 《李毅中总结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12个热点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gzdt/2008-02/28/content_904432.htm。

“人”的问题。这是对特定背景下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描述与概括，意指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在如何理解人、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徘徊、困顿，这成为制度和文化变革的深层障碍，其外在表现则是发生于亿万人身上的生命冲突。“人”的问题是思想和理论问题，从维新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从“文革”后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新世纪人权问题对话，它一直是中国文化论争的焦点。同时它更是实践问题，从“五四”时期的启蒙到抗战的觉醒，从社会改造到改革开放，它始终缠绕着社会变革的进程。这是从“人”的角度看到的社会文化变革，是在人的生命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

“人”的问题折射出亿万中国人在保守与变革、封闭与开放、倒退与进步等无数冲突中遭遇和承受的事实。面对外在于人的社会、自然的强大力量，人遭遇着似乎不可克服的阻力，所以会选择逃避的策略。例如，“大跃进”、“文革”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的伤害成为几代人的噩梦，巴金晚年用尽最后一份力量反省自我，然而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从未被认真对待。逃避固然可以暂时使人在精神的麻醉中获得解脱，然而结构深处的冲突并没有解决。走进自我生命的深处，走进民族精神的深处，需要以最大的勇气抛开歌舞升平的平庸与自我麻醉，揭开历史与现实的痛楚，直面隐藏于民族集体意识深处的问题与矛盾，让灵魂勇敢地走进命运的冲突世界，在抗争中获得新生的力量。这才是中华民族走出历史宿命的道路，这种反思也是在生命冲突中寻求解救的一种努力。

社会主义实践中“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中遭遇的根本矛盾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和发展中存在的/key问题之一。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总有某种距离甚至冲突，国际范围的共产主义

实践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反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人”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焦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遭遇了挫折,最受人们关注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剥夺。问题便被提出来: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人学的空场”?这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的历史行动区别开来。前苏联学者也认为,斯大林的清洗与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它不是践行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中,批判的思潮也此起彼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兴起最有影响。借助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以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为反思对象,以对世界大战中纳粹摧毁人道主义的反思为背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解读马克思成为潮流,人们从中发现了追求自由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历史反思的基础上,这种人文思想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这期间也经历了巨大的波折,其中包括遇到“人”的问题的困扰——如何理解人、如何对待人、如何塑造人的疑问始终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伴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是,它在中国面对的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于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革命”为核心话语的解读范式。革命斗争极其惨烈,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包括国内阶级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等都在革命过程中变得特别复杂。当争取国家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时,个体生命的价值便退居其后。革命话语的一个问题是倾向于仅仅把人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来看待。人成为大机器的微不足道的零件,一切由高高在上的决策者来安排,每个人只可以服从“上级”的安排。牺牲的悲壮与战斗的豪情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丰碑,同时也包含了某种局限,它所强化的社会本位思想与个体生命的张扬不相融通。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勇敢的牺牲无法取得胜利,对于无数先烈气